

平台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评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

郭浩田^{**}

摘要: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次经济危机如何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联。作者接着定义了“平台”,阐明了平台的特征并区分了平台的种类。作者分析了平台发展的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历史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该书在预测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略显论述不足,但对未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关键词:互联网 平台 资本主义 数据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话题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平台”作为核心的相关研究在社会学、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斯尔尼塞克(N. Srnicek)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书为平台研究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平台是这本书的起点,但作者分析的落点着重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环环相扣。过往的危机酝酿了当下的繁荣,而当下的繁荣又隐含着未来的危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次经济危机的结果,也是下一次危机可能爆发的起点。本文将遵循作者的章节安排,首先回顾平台资本主义的过去,即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接着探讨平台资本主义的当下,厘清平台的概念与分类;然后思考平台资本主义的问题与未来的可能性;最后探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 本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批准号:2018080604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郭浩田,剑桥大学社会学系。

一、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本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分析。在介绍平台资本主义之前,斯尔尼塞克首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史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他认为当下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战后的三次经济危机——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紧密相关,正是这三次经济危机为数字经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左右了其发展方向(Srnicek,2017)。

(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和东亚部分地区在战后重建之中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高收入经济体有两个值得观察的特点,分别是商业模式和就业性质(Srnicek,2017)。战后的美国制造业主导了全球经济,美国工厂大规模采用福特式的生产线,工人们遵循着泰勒主义的生产原则。不断壮大的工人群体因其相似的处境而组成了工会,促进了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并提高了工人的福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开始兴起,其发展受益于劳动力价格较低、熟练程度较高、汇率优势以及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尤其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等因素,美国的经济呈现了衰退的态势。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加剧了美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下滑,美国企业开始寻求一些解决之道,例如采用日本丰田式的生产模式,削减劳动力并打击工会,以及将大量的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这样的全球外包产业链的形成受益于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和泡沫息息相关。

(二)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与泡沫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美国的制造业迎来了短暂的健康成长。但好景不长,国际市场对于日本经济的担忧又使得日元贬值,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重回疲态。

与之相反的是互联网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作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本质是互联网的商业化,其内在驱动力是大量风

险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Srnicek,2017)。丹尼尔·席勒(Schiller,1999)也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互联网的商业化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在制造业前景晦暗不明的状况下,风险资本瞄准了互联网产业。在这一时期,美国有5万多家公司进入互联网领域,吸纳了大概2560亿美元的资本(Srnicek,2017)。这些互联网公司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也没有稳定的盈利,它们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抢占用户群体。

同一时期,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也获得了大量投资,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的经济体当中,电子通信产业是吸收外国投资最高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通信基础设施纷纷建立,包括光缆、数据存储设备和服务器。这大大降低了全球产业链的通信成本,方便了协调分工,也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向外转移。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也影响了美国的经济。为了延缓经济的崩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开始急速调低利率,实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里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Srnicek,2017)。这样的货币政策改变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由传统依赖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转变为从其他行业中寻求利润。这样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互联网行业投资的进一步成长,即使在互联网产业泡沫化以及“9·11”事件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并未停止。

此外,美联储的干预措施也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大量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投资点,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正是这样一个高风险、高收益行业。这些因素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做了铺垫。

(三)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6年前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房价的下降影响到了总体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家庭财富,这影响了他们偿还债务的能力。全面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于2008年爆发,以雷曼兄弟公司的倒台作为标志。此时,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与抵押贷款市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崩跌的房价使得许多次级抵押贷款成为烂账,金融市场一片愁云惨淡,美联储不得不出手救援。

美联储救市的方法依然是注入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取得了部分银行的权益,高额的私人债务因而转化成了公共债务。为确保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降至接近于0。同时,美联储也加紧同各个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合作,共同开启了一个低利率的环境(Srnicek,2017)。

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政府面临着高额债务,财政政策日趋紧缩,对于经济的刺激更加依赖于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金融投资的回报率降低,因此资本会更加倾向于寻求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数字产业即是其中之一。

近些年来,伴随着量化宽松政策,诸多科技企业将资金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这使得科技企业有了充足的资金投资人工智能之类的风险产品,但这种避税行为挤压了政府的收入,加剧了财政政策的紧缩,所以政府也更加依赖于货币政策。

要理解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理解资本市场的危机之外,还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作者认为,伴随着世界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衰落,待就业大军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劳动力的无产化进一步加深,许多人不得不依赖于不稳定、非正式的工作(Srnicek, 2017)。2008 年的次贷危机又导致了失业人口增加,尤其是长期失业人口的上升。长期失业人口的债务压力更大,更容易被迫接受不稳定、非正式的工作。这些失业的劳动力,与逐利的资本一起,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平台的特征与类型

2010 年前后,伴随着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进步,一批互联网公司随之兴起。它们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例如零工经济(gig economy)、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等等。一些观点认为,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中,劳动力越来越依赖于知识(knowledge),传统的产业工人正在被知识工人取代,即便是物质化的商品当中也蕴含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化要素。尽管作者承认这样的经济模式有一定新的成分,但他认为这些概念没有反映出问题的本质。这些公司的经济模式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范畴,它们的特殊点在于将数据(data)作为一种原材料。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作者首先区分了数据与知识的定义,接着阐述了平台的概念与特征,最后对平台进行了分类。

(一)作为原材料的数据

作者认为,数据是关于某事发生的信息(information that something happened),而知识是关于某事为何发生的信息(information that why something happened);数据可能会涉及知识,但这并不一定(Srnicek,2017)。数据并不能脱离物质基础而存在,数据的收集和储存都要依赖于一定的设备。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还要对数据进行清理和标准化处理。因此,作者将数据视为一种原材料(raw material),如同石油一样,需要提取、精炼、加工,最终用于不同目的(Srnicek,2017)。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数据一直在被收集和使用着,只不过程度不同。在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中,大量的数据丢失了,只有少量的数据被用于辅助生产。在精益生产模式中,全球供应链的建立加强了对数据的依赖,但仍缺乏对大量数据的提取和使用。这些既有的生产模式不能很好地利用数据这种原材料,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了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的成本。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一批企业通过对数据的高效利用,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传统的加工制造企业,也借助信息技术拓展了对数据的利用,向新的商业模式靠拢(Srnicek,2017)。

(二)平台的特征

在对数据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后,作者紧接着定义了平台。平台是使得两个或多个群组可以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介的平台沟通了不同的群体,包括顾客、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者、供应者,甚至非人的客体(Srnicek,2017)。平台通常还会有一些数字工具,用户可以借此创造属于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因此,作为用户活动发生的界面和用户之间互动的中介,平台具备了获取和记录数据的优势(Srnicek,2017)。基于此定义,作者分析了平台的四个重要特征(Srnicek,2017)。

第一,平台的范围远超互联网公司或科技公司。只要是数字互动发生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平台运行的基础。这一特征与下一节中平台的分类有关。

第二,平台产生并依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个平台时,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平台的价值就越来越大。平台用户数目的增长

可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并扩大平台收集的数据量,这些数据又可以经过分析用于改善平台的服务。基于网络效应,垄断的种子也扎根在了平台的基本特性之中。

第三,平台经常采用交叉补贴的策略(cross-subsidisation)。平台往往通过一些免费、低价的商品或者服务来吸引大量的用户,再通过一些较高价格的商品或服务获取利润,并对前者进行补贴。例如谷歌通过广告服务盈利,并补贴搜索服务。

第四,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平台只是一个供不同用户开展数字互动的空间,但实际上平台包含了一种政治规则,这个规则的制定者是平台的拥有者。尽管如此,这些既定规则还是允许不同用户生产一些意料之外的产品,可能超乎平台拥有者的预期,甚至撼动他们的地位。

(三)平台的分类

正如作者所说的平台的第一个特征,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可以成为平台企业。作者区分了五类平台:第一类是广告平台,这类企业借助数据分析来投放广告,例如谷歌;第二类是云平台,这类企业提供云存储和云计算服务,例如 IBM 和亚马逊;第三类是工业平台,通过工业互联网来辅助生产制造过程,例如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第四类是产品平台,通过出租自己的产品来收取费用,例如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 Spotify;第五类是精益平台,这些企业基本没有固定资产,大多是通过联结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来收取费用,例如 Uber 和 AirBnB(Srnicek,2017)。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与资本主义长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互相交织。精益生产和及时生产的模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一直在发展,而现在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正是同一个趋势的延伸。

三、平台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三章的题目是“大型平台战争”,这个“大型”既可以指平台的规模,又可以指战争的范围。伴随着平台的不断扩大,平台与平台之间、平台与用户之间、平台与监管者之间都会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对平台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平台与平台

基于网络效应的平台天然地带有垄断的倾向,平台企业会想方设法地提高数据的数量和丰富程度。平台企业常用的一种手段是建立封闭的生态系统,例如苹果和安卓两套手机操作系统,只能在不同的设备上使用;通用电气和西门子之间的工业互联网也不互通。这样一来,先发企业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并非牢不可破,大量的资本仍然可能造就新的优势平台。

在平台资本主义当中,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是降低产品成本的能力,更是对数据利用的能力。因此,对于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冲突,作者指出了四个趋势:第一,对数据提取和利用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了收集、存储、分析数据的基础设施;第二,占据关键位置,作者运用了“根基式”的比喻,指出平台将自身置于关键位置,例如互联网的入口,因此许多大型平台企业会投入自然语言界面市场;第三,市场融合,平台企业会涉足越来越多的产品领域,变得越来越相似;第四,生态系统封闭,平台企业会在寻求封闭软件系统的基础上,寻求硬件系统的封闭,但这有可能带来互联网的碎片化(Srnicek,2017)。

为了争夺用户,许多平台企业消耗大量资金打击竞争对手,这些企业的繁荣是建立在资本的狂热之上的。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均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各个网约车公司之间的竞争、各个短视频网站之间的竞争。这股平台战争的热潮伴随着资本的降温已经渐渐消退,许多平台企业将面临转型问题。作者预测,一部分企业将会转为提供奢侈的或急需的服务(Srnicek,2017)。

(二)平台与工人

尽管平台提供了竞争与控制的新方式,但最后决定平台未来的仍然是利润率。在作者看来,平台没有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只是吸走了制造业的利润。尤其是在精益平台的商业模式之中,工人和工会的反抗会大大增加平台的运营成本,例如Uber司机对企业的抗议以及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立法确认了工人与Uber的雇佣关系。最基本的工人权利一旦被确认,这种生产的模型便无法持续了。

(三) 平台与国家

作者在本章最后简要探讨了作为平台监管者的国家的角色。作者认为国家拥有控制平台的权力,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法律保障用户的隐私、保护工人的权益,打击平台企业的避税行为(Srnicek,2017)。作者同时提出,国家可以建设公共平台,但这样的公共平台需要独立于国家监控(Srnicek,2017)。国家也可以推动平台的后资本主义转向,利用数据来分配资源,促进公众参与,以期产生更先进的技术进步(Srnicek,2017)。

四、理论贡献与研究启示

(一) 理论贡献

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历史分析。全书仅有一百多页,单是关于三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便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也正是这一章的论述,让全书的基调确定在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平台上。作者在这一章的写作也让看似不相干的几个历史事件连接了起来,通过对三次经济危机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三次经济危机与平台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道理:技术进步了,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不变。亦即,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尽管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

本书同时批判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劳动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作者认为,历次经济危机带来了剩余劳动力,这些人更依赖于不稳定的工作,而平台企业,尤其是精益平台高度依赖于这些劳动力。尽管平台企业将自己提供的工作冠以“自由”等一系列动人的标签,但标签之下的剥削关系并未改变,劳动力的实际生存状况甚至面临着恶化的趋势。

本书对数据和知识的定义以及区分、对平台的定义以及分类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斯尔尼塞克并不是最早使用“平台”一词指代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学者,格里斯佩(T. Gillespie)早在2010年的研究中便探讨过平台的政治学,从牛津英语词典中梳理过平台的不同含义(Gillespie,2010)。许多学者对于平台的探讨,多集中于平台为不同用户的沟通提供了数字化基础设施上(Helmond,2015;

Schwarz, 2017; Hicks, 2017)。斯尔尼塞克接受了这一技术化的定义,但也抓住了数据这一关键特征,给出了政治经济学层面的一种定义,即平台以数据作为生产的原材料,而不是生产工具。本书对平台的五种分类囊括了传统的制造业与新兴的互联网产业,尽管研究者更多使用的是作为平台的后者,但前者的存在符合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分析,让作者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

当然,本书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平台的五种分类并不完善,各个分类之间可能存在交叉情况。作者用较大的篇幅探讨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当下,在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展望上略显不足。但这本一百多页的书不是一部翔实的理论著述或者实证研究,更像是一则启发性的研究,下面将简单探讨本书对既有和未来研究的启发。

(二)研究启示

《平台资本主义》一书对于研究的启发有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二是探讨平台资本主义与平台其他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是探讨平台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层面的研究,也是本土化比较充分的研究。斯尔尼塞克在书中简短地提到了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可能是西方平台发展的一种未来,因为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生活场景。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关注到了这类超级平台,探讨了这些平台的形成以及相关的治理措施(Plantin & de Seta, 2019; de Kloet, Poell & Zeng et al., 2019; 张志安、冉桢, 2022; 吕鹏、周旅军、范晓光, 2022);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平台如何剥削劳动者(孙萍, 2019)。在这一层面,比较缺少从经济史角度梳理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互联网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二个层面的研究是关于平台资本主义与平台其他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类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平台的所有权,在平台资本主义当中,作为技术架构的平台被企业所掌控,而如果所有权转移到用户或者集体手中,便会带来关于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或平台社会主义(platform socialism)的探讨。前者的研究例如肖尔茨(Scholz, 2014; Scholz, 2016)、帕帕迪米特罗普洛斯(Papadimitropoulos, 2021),后者的研究例如马尔杜恩(Muldoon, 2022)、马云志和王寅(2022)。

第三个层面是关于平台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类

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同主体,例如中小企业或者政府。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学者关注到了小资本主义与平台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Zhang, 2020),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国家与平台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Rolf & Schindler, 2023)。探讨平台资本主义与国家、公众间的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

总的来说,《平台资本主义》一书的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后续更多的研究,或立足于平台,或立足于资本主义,或立足于二者的结合点,均可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回顾,对其当下进行批判讨论,并对可能的未来进行展望。

参考文献

- 吕鹏、周旅军、范晓光,2022,《平台治理场域与社会学参与》,《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马云志、王寅,2022,《平台资本主义批判和重构平台社会主义——数字时代对平台经济的新运思》,《河北学刊》第1期。
- 孙萍,2019,《“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第6期。
- 张志安、冉桢,2022,《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路径、效果与特征》,《新闻与写作》第5期。
- de Kloet, J., T. Poell & G. Zeng et al. 2019,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 Helmond, A. 2015,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Society* 1(2).
- Hicks, M. 2017, *Programmed Inequality: How Britain Discarded Women Technologists and Lost Its Edge in Computing*, Cambridge: MIT Press.
- Muldoon, J. 2022, *Platform Socialism: How to Reclaim Our Digital Future from Big Tech*, London: Pluto Press.
- Papadimitropoulos, E. 2021, “Platform Capitalism,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nd the Commons.” *Rethinking Marxism* 33(2).
- Plantin, J. & G. de Seta 2019,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 Rolf, S. & S. Schindler 2023, “The US-China Rivalry and the Emergence of State Platform

- Capit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online first).
-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 Scholz, T. 2014, “Platform Cooperativism vs. the Sharing Economy.” *Big Data & Civic Engagement* 47.
- Scholz, T. 2016,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 Schwarz, A. 2017, “Platform Logic: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Platform-Based Economy.” *Policy & Internet* 9(4).
-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 Zhang, L. 2020, “When Platform Capitalism Meets Petty Capitalism in China: Alibaba an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latform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21).